



•历史回溯•

关于水杉采集与研究的历史真相^①

甄士明

中国科学院林业土壤研究所(现中国科学院沈阳应用生态研究所), 沈阳 110016

摘要: 本文实际作者为王战。本文以甄士明(意为“真事明”)叙事的方式写成。本文在1984年6月完成(见附录1油印稿), 内容含王战在油印稿上的批注。本文在王战在世时未发表, 现作为王战的遗作发表。本文回顾了王战采集和研究第一份水杉标本的历史。基于王战是第一份水杉标本的采集者和研究者这一事实, 王战是水杉的发现者毋庸置疑, 胡先骕和郑万钧是水杉的命名人和发表者, 水杉的发现与干铎毫无关系。

关键词: 王战; 胡先骕; 郑万钧; 干铎

甄士明 (2024) 关于水杉采集与研究的历史真相. 生物多样性, 32, 24380. doi: 10.17520/biods.2024380; cstr: 32101.14.biods.2024380.
Shiming Zhen (2024) On the fact of the history of initial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of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Biodiversity Science, 32, 24380. doi: 10.17520/biods.2024380; cstr: 32101.14.biods.2024380.

On the fact of the history of initial collection and research of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①

Shiming Zhen

Institute of Forestry and Soil Sciences (now Institute of Applied Ec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Shenyang 110016, China

ABSTRACT

The actual name of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is Chan Wang, who wrote a draft of the article in June, 1984, using a pseudonym, and edited it later. The article, which was initially in a mimeographed manuscript and was not previously published, is now being published as a piece of posthumous work from him. The mimeographed manuscript with hand-written notes and corrections from Chan Wang is included in this article as a supplementary material. Based on the fact that Chan Wang was the collector and researcher of the first specimen of *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there is no doubt that he is the discoverer of the dawn redwood. Hsen-Hsu Hu and Wan-Chun Cheng are the ones who named and published the species. The discovery of the species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uo Kan.

Key words: Chan Wang; Hsen-Hsu Hu; Wan-Chun Cheng; Tuo Kan

于1943年夏季, 王战教授在重庆歌乐山农林部中央林业实验所任技正期间, 被派与毛杰同志赴湖北省神农架探察时, 路过四川万县, 因病住在四川万县农校治疗。该校教务主任杨龙兴同志(是王先生北平大学农学院同学)他知道王先生对树木学造诣颇深, 特地告诉王先生在磨刀溪(现改属湖北利川县谋道溪)村边, 有一株大树, 非常特殊。王先生询

问杨一些特征, 初步认为是一个特别的树种。因此, 王先生则毅然决定不乘船赴巴东转赴恩施(当时湖北省政府所在地), 改由步行艰险的陆路经过磨刀溪前往恩施, 主要目的是为了看看并采集那棵大树的标本。王先生到了磨刀溪天色已晚, 翌晨大早起床, 首先去观察那棵大树, 仔细看了树形^②和枝叶。对王来说, 确是第一次看到这样一种树, 当即认为是一个特别的东西, 即采得了枝叶标本, 未看到果实(因生长在树的最上部), 因树木高大, 无法攀登。

① 该文由刘琪璟、钱宏、邵国凡整理; 该文实际作者为王战, 完成时间为1984年6月; 该文手稿于1984年6月20日交打字室打字, 油印50份; 该文根据王战对油印稿的批注(见附录1)及手稿整理; 该文手稿及王战批注的油印稿存于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档案室: 水杉档案——王战留存的历史资料(刘琪璟整理, 2024)。中英文摘要和关键词由整理者提供。

② 油印稿中为“树型”。

但树下有一小庙，匾额写“水杪庙”，还挂着很多“有求必应”的牌匾(这是大树得以保护的原因)。王先生想庙顶瓦间必有落下果实，即请临时工爬上庙顶看看有无果实，工人因迷信思想不肯上去，王即答应格外赏他酒钱，他才爬上庙，在瓦间拾得二十多个完整有柄的球果，果实也是很特殊。王先生怀着喜悦的心情，把标本采好(标本号118，^① 采集日期为1943年7月21日，采集人王战。此标本保存于江苏省林业科学研究所)，还测量一下胸径和树高，并询问当地老乡树龄^②有多大，回答说：大约上千年的岁数。即离开了磨刀溪，并沿途注意观察有无此树。他在离开大树不远的溪边地方见有一株高三米许的幼树，在山麓还看到一株较大的树，此外再无发现。他分析此树每年结种籽很多，必然会发生一些幼苗，大概砍作薪柴了^③。所以不见幼树生存。

王战教授把标本带回中林所以后，加以研究，球果及叶片颇似落羽杉属的东西，但中国无此属树种分布，故认为不应是落羽杉属的东西。又颇似水松，但球果与叶子都不相同，即认为是一个新种，但手中资料不足，无法肯定，未能定名。当时即在标本写上水松(*Glyptostrobus pensilis*)还在后面注了一个(?)号。后传王先生定名为水松籍以贬低他的水平，即由此而来。如果他认为就是水松，又何必把标本作为新东西请教他人呢？这不是多此一举嘛？就是有关人不说明此事，人人也会清楚地知道王是加以研究认为是近似水松的。在最后的定名结果中也说明了水杉是近似水松的。

大约在1944年春^④，吴中伦先生由沙坪坝中央大学到歌乐山中林所办事，王战教授即将采得的水杉标本拿给他看，并对吴说“我采到了一个新种，因手中文献不足，无法确定，请您带给郑万钧教授看看，是否是个新种？”^⑤王先生把附有球果的标本选出一份交吴带给郑看。约过二、三周之后^⑥，吴先生又来中林所办事。他对王战先生说：郑先生说了，不但是个新种，还是个新属^⑦。并把郑先生定名的纸

条交给王看，纸条上写的是“*Chieniodendron sinense* Cheng et Wu”^⑧ (中国钱木)。吴先生还说，这次用此标本纪念钱崇澍先生，以后再发现新种时，可以用你的名字命名作纪念。最后问王同意否？王先生当时顿了一下，表示同意。王战先生说：因为我尊重专家，才把标本送给人家看，人家定了名，应该表示同意，否则就不要送给人家看了。王先生还说：他当时也有个想法，按一般植物分类的惯例，新种的种名常用采集者的姓名命名，或者用两个定名人也是可以的，为什么郑先生不这样做^⑨呢？

在1946年6月间《中央日报》发表消息，胡先骕教授等发现了活化石——水杉。王当时在北京红十字会医院养病，他的同学纪人伟同志知道他最爱好树木，特拿报纸给他看，想叫他高兴。但他看了以后，知道就是他送给郑先生看的标本，对于发现经过毫未谈及，怀着不愉快的心情向纪说明了一下采集经过。

1945年春^⑩，郑万钧先生的研究生薛纪如同志(现任云南林学院教授)到中林所找王先生了解前往磨刀溪采集水杉标本的路线。薛教授现在还说：王战同志当时毫不保留地详细地把食宿站点的路线都作了介绍，使我顺利地采到了水杉标本。薛先生1946年^⑪两次前往采集了水杉花果完善的标本，连同王战采的标本应作为模式标本。以后华敬灿同志在利川县水杉坝也采到了水杉标本，但以后采集的标本都与第一个采集者有关系，如没有第一个采集者，水杉决不会在四十年代里载于科学史册。

于1946年即抗战胜利以后，郑先生把水杉标本和定名送给胡先骕审阅，胡先生认为不是新属，应用日本人三木茂发表的化石属把水杉定名为*Metasequoia glyptostroboides* Hu et Cheng，于1948年正式发表了。

正在此时，把水杉发现人说成是干铎教授于1941年发现的，此事是怎样出来的？据薛纪如教授说：干教授看到水杉发表后即对郑万钧教授说：我

① 油印稿中此处无标点。

② 油印稿中为“树令”。

③ 此处油印稿中为“新柴”，属打字错误，手稿中为“薪柴”。

④ 油印稿中为1945年春，应属笔误。根据王战留下的录音材料，该情节发生在1944年。而郑万钧得到标本后于翌年的1945年亲自去中林所，又一次获得标本，但王战(夷士)在1948年的文章中记述郑万钧到访中林所的时间是1946年，亦属笔误，应为1945年。

⑤ 油印稿中此处没有问号，手稿中此处有问号。

⑥ 油印稿中此句内无顿号。

⑦ 此处油印稿中为逗号，属打字错误，手稿中为句号。

⑧ 油印稿中学名为*Chieniodendron chinense* Cheng，种加词拼写和定名人信息应属笔误或记忆偏差。在《鄂北森林调查报告书之四》(1945)中，王战在水松学名旁边加了批注表示订正，所写学名为*Chieniodendron sinense* Cheng et Wu，定名人应为郑万钧和吴中伦。批注的时间应该是在郑万钧为118号标本定名后不久，而且是从吴中伦带给他的一张字条上转抄的，所以这个应该是郑万钧所定学名的完整、准确信息。

⑨ 此处油印稿中为“作”。

⑩ 油印稿中为1946年春，应属笔误。薛纪如于1946年2月和5月两次去采标本，而向王战了解行走路线是在前一年即1945年。

⑪ 此处油印稿中为“当年”，整理者将其替换为“1946年”，见上一脚注。

于1941年经过磨刀溪时，即看到此树，记得还采了一小块标本，夹在本子里。就这样，干教授就成了水杉的发现者了。实际上他的标本即使^①有的话，也未拿出来研究，这与水杉的发现问世根本无关，怎能说是他发现的？看到水杉和发现水杉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例如当地群众早就知道水杉，还为其建庙，能说他们是最早的发现者？即一般地采集了标本，由他人研究创立新种，这个采集者也不能算为发现者。但采集了标本，又加以研究，认为是个新东西，这就与一般的采集者大不相同了。

令人不能理解的是，1980年8月出版的《植物》杂志第四期发表的《水杉的发现》一文，不但说是干教授发现的，还歪曲事实地说，当时干采集的水杉标本交给郝景盛教授鉴定，被郝给弄丢了，实为遗憾。王战和薛纪如二位教授看到此文，感到非常愤慨。这完全是歪曲事实。郝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林学家和树木分类学家，对我国林业做^②出很大贡献，他已逝世多年了，还对他进行不负责任地^③嫁祸于人，这不是一个正派的科学家应有的态度。我们知道，年轻作者任荣荣同志是不明真相的，但作为作者任同志有责任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弄清水杉采集与研究的真相，澄清是非，以还历史的真面目。奇怪的是，无独有偶，还有些人也不了解真相，跟着人云亦云，姑且不论；但有的人^④明知真相，有

意在混淆是非，歪曲事实，他们的用心真叫人难以理解。

美籍华裔胡秀英博士于1975年到沈阳特地走访了王战教授。她问王说：“很多外国人和方文培教授都多次在万县一带采集标本，均未采到水杉，你为啥就这样幸运采得了水杉？”^⑤王说：“磨刀溪一带是湖北与四川交界的山区，交通不便，在旧社会该地区土匪出没无常，杀人越货之事经常发生，当时我是明知山有虎偏由虎山行，冒著生命危险走那条路的，才采得了水杉标本”。

1982年胡秀英博士在四川大学讲学时说：“我们不管国内有这样或那样说法，我们认为水杉的发现者是王战教授”。这说明人为制造的水杉发现的历史迷雾是遮挡不住铁的事实。

今天党的三中全会确定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这一路线指引下，这段水杉发现的历史公案也应该大白于天下了。我们澄清这段事实真相的目的，就是在于要还水杉发现历史的本来面目，要实事求是地^⑥尊重每个辛勤劳动的科学工作者的首创精神和捍卫他们的劳动成果。也要扫一扫学术界残存的那股拉山头^⑦、搞圈子^⑧，千方百计压制别人抬高自己的不良风气，以树立一个治学严谨^⑨、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

(责任编辑：黄祥忠)

附录 Supplementary Material

<https://www.biodiversity-science.net/CN/10.17520/biods.2024380>

① 油印稿中为“既是”。

② 油印稿中为“作”。

③ 油印稿中为“的”。

④ 指郑万钧。

⑤ 此处油印稿中问号在引号外。

⑥ 油印稿中为“的”。

⑦ 此处油印稿为逗号，属打字错误，手稿中为顿号。

⑧ 此处油印稿中为顿号。

⑨ 此处油印稿中为逗号，属打字错误，手稿中为顿号。